

● 出版编辑

编辑本质的研究及其再认识^{*}

杜 敏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2)

[作者简介] 杜 敏(1966-), 女, 陕西长安人,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副编审, 主要从事传播学、编辑学研究。

[摘 要] 关于编辑本质的研究异彩纷呈, 众说莫一。文中认为对编辑本质的认识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是: 对编辑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编辑现象充分描写基础上的内在联系的抽绎与提升; 编辑现象的描写应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以不同的线索来进行; 与编辑劳动相关的因素有宏观、微观, 内部、外部, 决定性、非决定性之分。

[关键词] 编辑本质; 编辑劳动; 编辑现象

[中图分类号] G 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6-0772-05

近年来, 编辑学研究在不断发展, 既拓展了自己的领域, 又不断深化与细化着有关问题的研究。就基本理论而言, 编辑本质的探讨也被凸现到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上, 因为探讨此问题, 不仅关涉到编辑学基本理论的建构, 而且对提升编辑学研究理论化程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目前的论文及著作, 关于编辑本质的研究却差异纷呈、论述各别。有鉴于此问题的重要性及莫衷一是的研究状况, 笔者以为有必要对此做一番梳理及再认识。

一、编辑本质的研究现状

对编辑本质研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对编辑本质的内涵在理解上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有人称为编辑劳动的本质,^{[1][2]}(第21页),^[2](第5-7页), 有人称为编辑活动或编辑工作的本质^[3](第227页)。

2. 研究的视角有分歧。部分学者论述时出现“编辑本质”的字样, 直接行文分析^[1](第21页)^[2](第5页), 大多数通过编辑概念的界定^[4](第38页)以及编辑活动的特点来间接反映^[5](第72页)^[6](第11页)。如对“编辑”概念的论述, 或从编辑活动所涉及的范围, 或从编辑活动的某些性质和特点, 或从编辑活动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等角度, 对编辑概念作出某些判断。在这些判断中有一部分达到了定义概念反映事物属性的要求, 有的仅是一种观念、观点的描述, 这些做法都试图揭示编辑劳动的本质。部分学者从现代编辑劳动的状态来曲折地研究编辑的本质。如通过编辑劳动在新时期的变化, 来对比编辑劳动在历史上的共同特点, 以寻找其本质的联系^[7](第109页)。

3. 研究的方法迥然有别。一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 运用各种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从马克思关于人类劳动形态的差异这一角度, 认为编辑的本质兼有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两种属性, 本质上仍然

^{*} 收稿日期: 2002-06-15

基金项目: 陕西师范大学校级重点基金资助项目(2001-03)

属于一种再生性精神生产劳动^[1](第21页)。从人类社会结构的组成这一角度分析,认为编辑在本质上不属于经济基础这个有机统一的任何一个构成部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在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2](第5页)。从事物相互联系的角度,通过分析编辑活动中的现实关系,找出编辑活动的两种结构和功能,从而分析编辑活动的社会本质^[3](第228页)。另一部分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采用分析法研究。如从社会精神文化构成的宏观角度研究编辑活动的本质,认为编辑活动的本质就是进行文化建构^[8](第18页)。又如从文化、社会文化心理构建的角度分析编辑劳动的本质,形成了多重性建构观^[5](第72页)。

与以上状况相应的是形成了纷然而芜杂的结论,有些观点还引起了针锋相对的系列论争,不是认为对编辑本质的描述不准,就是认为揭示的基点有问题。所以,要有较为明晰的认识,确立编辑本质研究的基本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编辑本质的研究原则

关于编辑本质的研究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笔者以为可遵循以下的研究原则:

(一)明晰“编辑本质”的内涵

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可以反映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从哲学的角度看,“本质”就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它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所决定,是事物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本质”与“现象”是相互对立的一对概念,本质从整体上规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现象是本质在各个方面的外部表现,是事物表面的、零散的和多变的方面。这些零散和多变的方面,用以反映事物的本质时可分为假象与真象。真象从某一方面表现事物的本质,假象则是事物本质的一种歪曲的、颠倒的表现。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过程”。

那么编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编辑的本质就是编辑劳动现象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的、稳定的、一贯的联系。这种编辑现象是就编辑劳动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外在现象而言的。要抓住编辑的本质,就要对编辑劳动丰富多样的外在现象进行详细描写,区分出真象,剔除假象。不仅如此,还要对真象准确定位,深入分析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着编辑的本质,哪些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这样才会对编辑劳动的本质有全面的把握和正确的认识。

(二)确立描写编辑劳动的两个方向

编辑劳动是一项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编辑现象及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往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多种形态的转化。正因如此,要从纷繁的编辑劳动中体认出编辑的本质,就要对编辑劳动进行多维度的描写。但在专职的编辑劳动出现之前,编辑的主体意识不强,有关编辑活动的记载、编辑过程的记述相对较少,这就使描写出现了一定的难度。要从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中找寻编辑劳动的痕迹,使描写丰而不乱、多而有序,就要按照一定的线索来进行。笔者认为,可从共时与历时两个方向来进行。因为某一历史阶段共时现象的形成是历时现象在此阶段的积淀与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历时变化又是共时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果。共时描写是基础,历时描写是手段。

1. 共时描写。所谓共时描写,就是选取历史上某一阶段编辑劳动的诸多现象,对之进行如实、客观地分析和描写,得出编辑劳动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构成及所具有的特点。这种描写是对不同时代的编辑劳动做横断面的描写与分析。

如研究当代编辑劳动的状况,就是要将信息技术带给编辑劳动的特征描写出来。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环境正在形成,带给编辑劳动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从数字化的影响来看,要求作者的投稿、编者的加工要符合信息资源数字化的要求,要适应电子计算机的自动识别。从网络化的角度看,互联网的出现,使信息的载体由传统的纸质型向电子媒介方向转变,同时带来了编辑主体与受众关系的转变。传统的编辑流程和作者——编者——读者的关系也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编辑活动都可集中于网上来实现。编辑劳动中的诸项活动呈现出交互、开放的关系,出版的周期在缩短,稿件的时效性在增强。从信息智能化的角度来看,编辑主体活动的作用在不断的增强,主要体现在策划组织的作用不断增强,创造性劳动的性质在强化,优化选择的导向功能在增强^{[9][3]}(第128页)。

对新时期编辑劳动进行描写以后,将之与近代以来的劳动状况进行比较,其中所出现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主要有:(1)编辑劳动的领域扩大了。从图书、杂志、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和广告制作等方面,延伸到光盘、磁盘、网络传播、计算机软件和信息咨询等非常广阔的领域。编辑活动技术也超越了以纸质为中心的印刷时代,走向光电和软件传播的时代。(2)编辑劳动的频率大大加快。(3)编辑劳动由原来的单向传播朝双向、多向交互式转化。(4)编辑劳动由原来的单一服务,转化为综合性服务^[7](第109页)。这样获知编辑劳动的变化与发展状况,为获知编辑的本质打下了基础。

如果以上这样的描写与对比,发生在编辑劳动的不同历史层面上,那么对于获得编辑劳动的总体规律,对于获得编辑劳动的本质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2 历时描写。如果把古今的编辑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和考察,那么对编辑劳动进行历时的描写就十分必要了。所谓的历时描写就是关于编辑劳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表现所进行的比较性的描写。对编辑劳动的历时描写,可以依据不同的线索得出不同的比较结果。这些结果从各个角度对全面了解编辑劳动的历时变化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从下面的一些线索来进行。

从信息复制技术这一线索来进行。编辑劳动作为信息传播中的一个环节,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信息内容进行加工,并使之传播出去。而信息传播范围的广狭、传播速度的快慢又是与人类信息复制技术的先进与落后密切相关的。因为信息传播技术可以不断地沟通和扩散各类信息,连接各种独立的信息的终端,使社会形成一定的信息网络。这种信息网络的形成,对经济发展、社会协调、管理体制、文化扩散和人际关系都产生着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哈洛德·英尼斯就认为,传播工具的使用创造了人的行为模式和精神状态,传播的发展刺激着文化表象和象征符号的重新组合^[10](第3页)。可见,每一次信息复制技术的提高,也就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都会使编辑劳动的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由此可带来人类传播文明的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来看,编辑劳动似乎可以分为刻契型编辑劳动、手抄型编辑劳动、印刷型编辑劳动、拷贝型编辑劳动等几种不同的形态。

再如从编辑劳动的社会功能这一角度来描写,编辑现象可分传播正统文化的编辑劳动、传播俗文化的编辑劳动。传播正统文化的编辑劳动,主要是指官方设立的编辑机构中,编辑人员主要是编辑一些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传播内容,使之推向受众,影响受众。如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对于儒家经典的编辑出版一直是封建社会编辑劳动的一个主要内容。仅以清代的编辑劳动而言,从顺治朝始经康熙朝,司礼监主管的内府刻书,刻有《孝经》,翻刻明北监本《十三经》(1673年),刻印《日讲四书解义》(1674年)及《御定补刊通志堂经解》。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年始,武英殿开馆刻书,刻本有300多种以上,其中卷帙最多、流通最广的是《十三经注疏》等书。清末,在曾国藩设于安庆的第一个“治山书局”的影响下,各地官办书局纷纷出现,并以重兴文教为宗旨,翻刻大量的内府本、武英殿本国学丛书。如同治年间广东、江西书局重刊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同治、光绪年间,浙江书局、江西书局、崇文书局、江南书局相继重刊《御纂七经》。光绪二年(1876年),江南书局重刊武英殿本《仿宋相台五经附考证》,等等。这些对传播正统思想及文化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种类型的编辑劳动,是以往编辑劳动的主流形态。与之相反的非主流的编辑劳动形态,多是在民间的一些书坊所进行的一种编辑活动,传播的主要内容也多是市民文化,即传播俗文化的编辑劳动。宋代以来,坊刻的编辑劳动很有代表性,其以福建建阳的坊刻编辑劳动最为典型。因其以赢利作为目的,因此刊刻的对象多属社会中下层,发行了大量的通俗读物,如各种酬世大全、医卜星相、农工杂技等应用性较强的书籍,出版了大量的为官府私家刻本所不齿的话本小说、杂唱变文等俗文学读物,如《武王伐纣》、《宣和遗事》、《三国志》等。“这些为社会所急需,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科普、文化读物,对传播文化科技知识是有积极作用的。”^[11](第38页)福建建阳坊刻在宋代最为发达,元代以来,不少的话本小说、戏剧底本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流

传下来的。

另外,还可以依据编辑劳动规模的大小对编辑劳动进行描写。编辑劳动规模的大小不同,与之相应的编辑手段、编辑方法、信息传播的范围大小也就不同。所以,从编辑规模的大小也可窥见编辑劳动发展的一系列情况,也就可以将它作为编辑劳动现象描写的线索。如萌芽状态的编辑劳动、兼职性的编辑劳动、专职性的编辑劳动、群体化的编辑劳动、工业化的编辑劳动、电子化的编辑劳动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以上仅是描写编辑劳动的几个不同的线索,还可以依据其他方式来进行历时的描写。

(三)分析与编辑劳动相关诸因素

也就是确定与编辑劳动现象相关的诸种因素,并依据这些因素,对多样的编辑现象进行条分缕析,将之归类,看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编辑劳动,哪些因素只是某一时代的局部的影响性因素。对编辑劳动的相关因素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分为不同的类别,比如宏观因素、微观因素;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决定性因素、非决定性因素等。

1. 宏观因素、微观因素。从人类编辑劳动出现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影响编辑劳动的因素,

